



《师友襟期》
周汝昌 著
周伦玲 整理
北京出版社出版

古之学者必有师。韩愈《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受（授）业解惑也。”重友者霸，重师者王，与可师者为友，积富于心，博学睿智，可求教，可切磋。师友一体，学问情感融合，智慧情趣共享，途不知远矣。在治学研红的道路上，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结交了诸多师友，或是亲见面谈，或是风雅笔谈，或是知己故交，或是一面之缘，都令他难以忘却。在《师友襟期》中，周汝昌先生既以饱含深情的文字讲述了许多引导他走上红学之路的师长前辈，还首次展示了大量难得一见的往来书札手迹。俗话说，所谓“人”，往往对“己”而言。“名曰写人者，实为写己，不过借径之一途罢了。”正如周汝昌之女周伦玲在“编后记”中所言，“‘因为传他，亦可传我’，此《石头记》

中一条批语……可以看出父亲撰文中流露出的为学之乐，获益之情……（以及）他一生奇异而丰富的学术幸运与享受。”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晚清国学大师王国维概括的“成大学问者”的境界。假若《红楼梦》是文学崇山峻岭之间的“世界之巅”，那么周汝昌则是继胡适之后“曹学”之集大成者，坊间公认“当今中国红学第一人”。有统计显示，他先后出版了数十种红学专著，可谓“著作等身”。对《红楼梦》研究中涉及的“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各个分支，先生均有独到见解，这也是“红学界”的定论。在“红学”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先生的追求可谓执著，即使“骨瘦形销”也“终不悔”。即使耗到了“蚕丝尽、蜡泪干”的程度，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周，他还计划再写一部《梦悟红楼》的书，连“大纲”都列出了。“周汝昌先生是真正的红楼精神的痴情守望者。”当代红学家、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赵建忠撰文称：周汝昌对“红楼”痴迷到宁可自己和家人的生日不过，也要坚持每年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祝寿，大概“只有对《红楼梦》具有宗教般的感情，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红缘辐辏，蔚为壮观。《师友襟期》既叙述了周汝昌先生研红路上相继结识的顾随、胡适之、邓之诚、陶心如、张伯驹等“鸿儒72家”，还列出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

与可师者为友 ——读周汝昌《师友襟期》

刘英团

者。周汝昌与藏书家陶洙的奇缘，就缘起“红学”。“说起来真够得上一个奇字”，仅因为知道周汝昌先生研究《红楼梦》，陶洙就觉得“有些事可以叙叙”。在《陶心如先生》一文中，先生深情地回顾了与陶洙交往的“秘闻奇事”。正如先生所言，二者“素未平生”，又是“年大许多的长者”，却“如此屈尊下顾，贡此独知之秘”，这种赤诚若非痴爱《红楼梦》，大概已经很少有人能像周汝昌、陶洙他们能为一本书、一种文化而沉浸自得、怡然自乐了。《红楼梦》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应《北京大学学报》邀请，先生曾撰文《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严厉地批评了那种“以非学充学之名，占学之位”的畸形事态：“自从（鲁迅）先生于1936年去世以后，这种以真‘学’为质素的‘红学’竟然毫无发展与进境。”

痴方能执著，方能锲而不舍方能无退，即不悔。“说起周汝昌，我跟他的考证结果正好相反，然而我不能不佩服他，搜罗之丰富，用力之勤，都不可及。”正如台湾已故著名作家许晏骅先生所言，一世红缘，一生为红楼解梦。《红楼梦》不仅是周汝昌先生一生研习的对象，更是他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之所在。一件事情的成功，总不是偶然造成的，沈从文比周汝昌先生大16岁，还是全国知名作家，两人还有过争论。“一日，上头通知周汝昌到部里开会……最后来的，是一位老

者，穿着深色中山服，夹着黑色真皮包……一看就大有来头的那种”，“一进门，老者就跑到周汝昌的面前，握着他的手说，你就汝昌吧，你好哇，汝昌，久闻大名啊，汝昌”，这个老者就是沈从文。先生感慨，“沈先生见了我表现的那种热情亲切的风度，说明他真是一位忠厚长者，大度君子，没有任何世俗常态‘小气’。这样的学者，是真学者。我一直挂念……对我们来说……（学术争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这种认真执著的精神，以及不计得失的胸襟，这才是真正的学者精神。”

有人说，“知音难求”，而我认为，书音更难求，它虽不会开言，更不会辩解，但自有有缘人。“The past is never dead, it's not even past”（历史永远不会消亡，甚至不会过时），静观周汝昌先生回忆师友间的陈情旧事，不仅有学问研究上的探与究，更有做人做事的方与圆。千秋一寸心，红楼无限情。那些书札、函件、手迹、题诗、赋诗照片以及先生与许多友人的留念合影，也都与治学研红有关。痴的人最容易撞到更痴的人，痴人撞到一起，总能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什么是一位学者应有的态度与精神？《师友襟期》给出了“标准答案”，其中既是先生的治学底线和研红态度，还有红学大师周汝昌的“情怀”与“气质”。这些，都需要我们用眼去看，用心去读，用灵魂去感受，用行动去传承。

让知识的种子成长

胡晓延

在半读半农中勉强完成学业的我，18岁便步入军营，面对全新的世界，所学知识的匮乏，让我深陷“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窘境。

紧张的军事训练之余，每月领到手的有限津贴，几乎都被我送给了书店，少年钟情和青春萌动全在黄金屋与颜如玉中寻找慰藉。我用不停歇的脚步，在夜校补习与成人教育中辗转奔走，借此打发枯燥而火热的军营生活，在学习中积累与成长。即便已是超期服役的老兵，我仍怀有初学之心，跟着同乡战友学起了新闻写作，不长时间，竟有“萝卜条”“豆腐块”之类的新闻稿散见报刊。

一个初冬的傍晚，树叶已开始飘零，下连队当“兵”的团政治处主任把我叫到连部，说是师里一位老战友要他推荐一名同志到师部图书馆当管理员，问我是否乐意？此时，读书已成为我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求之不得。打起背包，我走进了藏书数万册的师部图书馆。

图书馆工作与紧张的连队生活相比，颇为“清闲”。除了整理图

书、办理借阅证、定时为官兵开放外，剩下的大量时间，我都把自己关进了书的海洋。中外名著、名人传记、诗词歌赋、科普知识等等，几万字至几十万字的大小部头，吸引我通宵达旦，第二天天明，虽然两眼已布满血丝，却照常做早操。后来，我干脆卷起铺盖住到了图书馆。几年下来，我已连续集中阅读了不少书籍，渐渐地又有了新闻写作的欲望，开始琢磨如何写“活”新闻。借几次下连队送书的机会，我又迅速捕捉到鲜活的第一手材料，并写成新闻稿件投往报社，庆幸的是，所写稿件屡次被采用。

见我对读书与新闻写作如此热爱，“两杠二星”的中校科长把我调到宣传科报道组，专门从事全师的新闻宣传工作。“两杠二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常有小说和报告文学在《小说月报》《解放军文艺》等刊物上发表。其“牛刀”之锋利，令尔等“初生牛犊”为之咋舌！有时我兴冲冲拿来一篇千余字新闻稿，却被“两杠二星”手起“刀”落，砍得面目全非。一次次当面点评，一次次耳热心跳，日积月

累，不知不觉间，我采写的新闻稿件已能在“千军万马”中抢滩登陆，在各大报刊重要位置刊出，并屡次获奖。1996年年底，因新闻宣传成绩显著，师里为我荣记个人二等功一次。转入地方分配工作时，二等功奖章使我顺利地进入到了现在所从事的电力事业。平日里读书看报的习惯已融入骨血，多年来，我不曾放弃，不敢懈怠，总是忙中偷闲挤出整块时间，来一次酣畅淋漓地阅读，这是对我知识能量的补充，更是对灵魂的自我荡涤。

那年秋季，正是著名作家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之时，耄耋之年的老父亲，突发心梗住进了医院。在日夜守护父亲度过危险期后，我逛遍了城区的几家大型书市，将莫言的《蛙》《丰乳肥臀》《红高粱》《生死疲劳》等作品悉数收入囊中，静心阅读，与作家第一次深入接触，让自己的内心尽可能地走进东北高密乡，走进滋养“诺奖”的这片沃野。一个月后，当我牵着父亲的手走出医院时，我自己也从莫言的小说中走了出来，身心顿感从未有过的畅快。转瞬离开家乡30余

年，不曾有机会与父母长时间交谈，是老父亲给了我们子女膝下尽孝的机会，更弥补了我没能拥有大块时间读书学习的缺憾。

读书，让我不断汲取知识的养分，悟出人生一世，应多一份纯真执著，少一份杂念私心，最大限度活出一份属于自己的精彩。读书也为我从事企业新闻宣传积蓄了力量，高峰时段，我曾一年在《安徽日报》《国家电网报》《中国电力》等省级以上媒体各版面发表头条文章达30余篇，一摞厚厚的奖章、证书，见证了我这几十年来孜孜不倦读书的历程。

（作者系安庆供电公司职工）

